财政工作的重要指针

——学习《邓小平文选》有关财政问题的若干论述

左春台 宋志刚

《邓小平文选》是我党历史上又一部马克思主义的珍贵文献，收入了邓小平同志从1975年到1982年9月的重要论著。它是伟大历史转折时期的产物，是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的产物，是探索“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产物，内容十分丰富，涉及政治、经济、科学、文化等四化建设的各个方面。尽管其中没有一篇是专论财政工作的，但是大多数篇幅中都涉及到财政问题。邓小平同志有关财政问题的论述，是对我国财政工作历史经验的高度概括，对于当前和今后的财政工作，都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

（一）搞建设要靠自力更生为主，艰苦创业

毛泽东同志一贯倡导“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这是我国的一条基本国策。三十多年来我们就是依照这条方针走过来的。邓小平同志在向外国朋友介绍我国经济建设的经验时着重指出：“中国的经验第一条就是自力更生为主。”（《邓小平文选》第361页）胡耀邦同志在党的十二大报告中也谈到：“我们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必须立足于自力更生，主要靠自己艰苦奋斗。这是绝对不能动摇的。”因为在我们这样一个大国搞四个现代化，不可能象某些小的国家和地区那样走依赖别国资金和技术的“捷径”，不立足于自力更生是不可能的。从国内外的实际经验看，要从发达国家取得资金和先进技术并不是容易的事。即使取得了，也还有一个偿还能力和消化

能力的问题。不能盲目引进，重复引进，一哄而起，造成很大浪费。当然，为了加速发展我国的经济，必须积极而有效地利用国外的资金和技术。国家无论大小，都各有长处和短处，优势和劣势。我们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扩大对外经济技术交流，以我之余，易我之缺，扬我之长，避我之短，不仅不违背自力更生，而且是自力更生“题中应有之义”。所以，我们必须一方面实行对外开放政策，另一方面仍要坚持建国以来毛泽东同志一贯倡导的自力更生为主的方针。“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我们的立足点。”（同上，第372页）

邓小平同志指出，中国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搞四个现代化，就“要有一股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同上，第221页）早在建国之初，毛泽东同志就指出：“要使全体干部和全体人民经常想到我国是一个社会主义的大国，但又是一个经济落后的穷国，这是一个很大的矛盾。要使我国富强起来，需要几十年艰苦奋斗的时间，其中包括执行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这样一个勤俭建国的方针。”遗憾的是，由于林彪、“四人帮”的破坏和十年动乱，我党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在不少人的心目中淡薄了，有的把它当作过时的东西，有的甚至把它作为错误的口号来“批判”，有的虽然口头上说艰苦奋斗，却不愿意实行。在这种情况下，重新提出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并且把它作为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具备的“四个前提”之一，就显得格外必要和迫切。邓小平同志说，必须再一

次向干部和群众进行艰苦创业的教育，“中国搞四个现代化，要老老实实在地艰苦创业。我们穷，底子薄，教育、科学、文化都落后，这就决定了我们还要有一个艰苦奋斗的过程”。

（同上，第221页）当然，提倡艰苦奋斗，决不能作为不关心人民生活的借口，一定要随着生产的发展，使人民生活逐步得到改善。但是无论如何，艰苦奋斗的光荣传统不能丢。邓小平同志要求我们的党员、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要带头艰苦创业。“一定要努力恢复延安的光荣传统，努力学习周恩来等同志的榜样，在艰苦创业方面起模范作用。”（同上，第224页）他要求工人阶级要为实现四化作出优异贡献，“大大加强企业的经济核算，大大提高劳动生产率和资金利润率”。（同上，第126页）他特别强调，艰苦创业最大的问题是要杜绝各种浪费。他说：“要使大家懂得，我们的资金来之不易，我们生产出来的东西来之不易，任何浪费都是犯罪。”（同上，第225页）学习邓小平同志这段语重心长的话，面对着当前大量存在的浪费现象，难道我们还能视而不见、听而无闻吗？还不应该挺身而出，坚决打击经济领域里的犯罪活动，从思想上、制度上、行动上杜绝一切浪费吗？

（二）坚持量力而行、综合平衡的指导方针

量力而行，综合平衡，是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在经济建设上的体现。多年来，我国经济的发展几起几落，走过了一条曲折的道路，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在经济建设的指导思想存在着“左”的错误，脱离客观实际，急于求成，不量力，不讲综合平衡。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拨乱反正，解放思想，在经济建设上重新肯定了量力而行、综合平衡的指导方针。但是，有的同志把解放思想同实事求是对立起来，似乎坚持量力而行和综合平衡，是思想不解放的表现。我们做财政工作的同志，有的也觉得人家都想“大干快上”，都“点头”，而自己“摇头”，说没有那么多

钱，似乎理不直、气不壮，跟不上“形势”。其实，这是完全不对的。让我们看一看邓小平同志怎么讲的吧！邓小平同志在1980年12月中央工作会议上指出，三中全会以后，陈云同志负责财经工作，提出了调整方针，中央对此作出了决定。但由于全党认识很不一致，也很不深刻，所以执行得很不得力。这次调整，就是进一步贯彻这一方针。他说：“基本建设要退够，一些生产条件不足的企业要关、停、并、转或减少生产，行政费用（包括国防开支和一切企业事业单位的行政管理费用）要紧缩，使财政收支、信贷收支达到平衡。生产建设、行政设施、人民生活的改善，都要量力而行，量入为出。这就是实事求是。下决心这样做，表明我们真正解放了思想，摆脱了多年来‘左’的错误指导方针的束缚。”（同上，第314—315页）这就把量力而行的指导思想提到一个很高的也是应有的位置上了。怎么能说坚持量力而行，是思想不解放、跟不上形势呢？难道只有脱离实际的“大干快上”才是思想解放、跟上形势的表现，才理直气壮吗？如果没有1980年12月中央下决心调整，确定“两平一稳”的方针，能有今天国民经济健康发展的局面吗？

量力而行，“力”的界限在哪里？就是要搞好财政、信贷、外汇和物资的综合平衡，即从全局的观点来考虑平衡问题。邓小平同志在谈到加速改进军队装备的必要性时说：“这里有个条件，请大家注意，就是要根据可能。国家只能拿出那么多钱，用于军事方面多少，还要进行综合平衡。”（同上，第75页）坚持综合平衡，就是达到按比例发展经济。“没有按比例发展就不可能有稳定的、确实可靠的高速度。”（同上，第147页）

应当清醒地看到，要使量力而行、综合平衡的指导方针真正在人们头脑中扎根，能够落到实处并一贯坚持下去，并非易事。1981年国家花了很大气力压缩下来的基建规模，1982年由于地方、部门、企业自筹资金以及银行贷款的大量增加，全国的基建规模又膨胀起来，今

年还有发展的趋势。这是值得严重注意的。认真学习邓小平同志有关这方面的论述，应象服一付清凉剂一样，将我们发热的头脑清醒起来，立即刹车。否则，来之不易的经济发展的的大好形势，将有得而复失的危险。

（三）正确处理集中统一和适当分散的关系

实现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不仅需要技术上的重大改革，而且需要对经济管理体制等进行多方面的重大改革。邓小平同志把改革作为进行四化建设的四个最重要的保证之一。改革牵涉到集中统一和适当分散的关系问题。邓小平同志在谈到经济民主时说，过去我们的经济体制权力过于集中，应当让地方和企业有更多的经营管理自主权，充分发挥国家、地方、企业和劳动者个人四方面的积极性。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在处理中央与地方、国家与企业的关系方面，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对于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促进国民经济发展，起了很好的作用。

邓小平同志在要求扩大地方和企业自主权，发挥各方面积极性的同时，提出“要防止盲目性，特别要防止只顾本位利益、个人利益而损害国家利益、人民利益的破坏性的自发倾向。……防止对自主权的曲解和滥用。”（同上，第322页）他在要求发扬民主的同时，又强调必须有必要的集中统一：“我们要发扬民主，但是同时需要集中。也许现在和今后一个相当时候，更要着重强调该集中的必须认真集中，以便把效率提高一些。”（同上，第246页）邓小平同志在这里讲的是组织原则问题，但对于财政经济问题同样是适用的。邓小平同志不是一概否定分散，也不是一概否定集中，而是该集中的集中，该分散的分散，把集中和分散辩证地统一起来了。

“该集中的必须认真集中”，是不以人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而是由我国的社会性质决定的。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坚持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原则。由此决定了我国

经济活动的主体应该是计划经济的集中，而不是市场调节的分散。如果削弱了必要的集中统一，就不是前进，而是后退，就不能保证我国经济沿着社会主义道路前进。

“该集中的必须认真集中”，也是当前我国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邓小平同志说：“在调整中实行高度的集中统一，是完全必要的。”

（同上，第321页）我们当前仍处在调整时期，国民经济突出的问题是能源、交通紧张，成为制约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现在，一方面，国家急需的能源、交通重点建设资金得不到保证；另一方面，财力物力过于分散，各地各部门又用来搞了大量不符合宏观经济要求的项目。为了改变这种状况，迫切需要集中一部分财力物力，来加快能源、交通等重点建设。在这个问题上，全党和全国人民要统一思想，提高认识，顾全大局。“只有党内党外上下下人人都注意照顾大局，我们才能够顺利地克服困难，夺取四个现代化的光明前途。”（同上，第162页）

（四）坚持按劳分配和物质利益原则，反对平均主义和一切向“钱”看

按劳分配，本来是社会主义的一个重要原则，但是“四人帮”却把坚持按劳分配，贯彻社会主义物质利益原则，说成是“物质刺激”、“福利主义”，结果干多干少一个样，干好干坏一个样，干与不干一个样，严重挫伤了广大群众的积极性。邓小平同志当时就对此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以后又多次谈过坚持按劳分配问题。他说，在分配上搞平均主义，不符合按劳分配原则。“不讲多劳多得，不重视物质利益，对少数先进分子可以，对广大群众不行，一段时间可以，长期不行。”“革命是在物质利益的基础上产生的，如果只讲牺牲精神，不讲物质利益，那就是唯心论。”（同上，第136页）他强调对于得好的、干得差的，要“经过考核给予不同的报酬”。（同上，第99页）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在农村和城市进行的若干改革，如联产计酬、调整职工工资和恢复奖金制

度等，基本上符合邓小平同志上述精神的，虽然还有待完善。

邓小平同志在提倡按劳分配、反对平均主义的同时，坚决反对一切向“钱”看。他批评那种只顾自己多得，不但不顾及左邻右舍，甚至不顾及国家利益的做法，实际上是“改善”了少数人的生活，增加了全国人民很多的困难。他说：“我们提倡按劳分配，承认物质利益，是要为全体人民的物质利益而奋斗。每一个人都应该有他一定的物质利益，但是这决不是提倡各人抛开国家、集体和别人，专门为自己的物质利益而奋斗，决不是提倡各人都向‘钱’看。”（同上，第297页）在我们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个人利益离不开整体的利益，整体的利益和个人的利益从根本上来说是一致的。只能在生产发展的基础上逐步改善人民生活。只有国家富强了，个人的富裕才有了可靠的物质基础。邓小平同志还强调：“多劳多得，也要照顾整个国家和左邻右舍。”（同上，第223页）

在贯彻物质利益原则的同时，思想政治工作不是要削弱，而是要加强。这里关键是做好引导。从我国实践经验看，涉及个人利益的问题，象奖金等上去容易下来难，即使是不合理的，上去了也很难下来。所以，邓小平同志指出：“解决这类问题，步子一定要稳，要对群众很好地进行引导，千万不能不负责任地许愿鼓动。”（同上，第223页）光在奖金等方面许愿来调动积极性是不能持久的。要进行以共产主义为核心的精神文明的建设，这是使我国现代化建设沿着社会主义方向前进的重要保证。目前在基建规模膨胀的同时，消费基金的增长也有失控的危险，这同样是值得严重注意的。

（五）在坚持对外开放和对内搞活经济的政策的同时，要坚决打击经济犯罪活动

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必须实行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经济的政策。这一政策已开始见到成效。但是，凡事有一利就有一弊。对外

开放，资本主义那一套腐朽的东西就会钻进来；对内搞活经济，活到什么程度，也是个问题。邓小平同志说：“所以，我们要有两手，一手就是坚持对外开放和对内搞活经济的政策，一手就是坚决打击经济犯罪活动。没有打击经济犯罪活动这一手，不但对外开放政策肯定要失败，对内搞活经济的政策也肯定要失败。”（同上，第359页）邓小平同志指出，要把打击经济犯罪活动这个问题，提得更高一点，看得更深一点，如果不把贪污盗窃、损害国家利益的歪风坚决刹住，“那么，我们的党和国家确实要发生会不会‘改变面貌’的问题。这不是危言耸听”。（同上，第358页）因此，他把坚决打击经济犯罪活动，看作是坚持社会主义制度、搞好现代化建设的四个保证之一，是一个长期的经常的斗争，四个现代化每走一步，打击经济犯罪活动都是伴随着的。

经济犯罪活动的猖獗，从根本上说，是资本主义侵袭和资产阶级思想腐蚀的结果。但是，如果思想上没有认识这个问题的严重性，法制不健全，执行不严，打击不力，也会给经济犯罪活动以可乘之隙。邓小平同志提出，全党同志和全体干部都要按照宪法、法律、法令办事，学会使用法律武器（包括罚款、重税一类经济武器）同各种经济犯罪活动作斗争，这是我们必须尽快学会处理的新课题。从我们从事财政工作的同志来说，第一，要提高认识；第二，要健全法制，包括会计法、成本法和各类税法，堵塞漏洞；第三，要加强监督，积极而持久地开展打击经济犯罪活动的斗争。

以上仅是我们初步学习《邓小平文选》的几点体会。文选中还有其他一些重要论述，如健全和严格规章制度，加强财经纪律，提倡顾全大局，学会当好红管家，解放思想既是反“左”又要反右，等等，都有很强的现实指导意义。学习《邓小平文选》，就要把邓小平同志的有关财政的指导思想，落实到我们财政工作的实际中去，以此来指导我们的行动。只有这样，财政工作才会打开新局面，我们才能在四化建设中作出应有的贡献。